“勤敏”是本书主人公的谥号。古人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逸周书·谥法解》),可见谥号是对死者依照其生前事迹而评定的称号。这位被谥“勤敏”的人，就是费迪南德·弗比斯特（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他的汉名是南怀仁（本书中的人物，凡有汉名者，均用其汉名，不再用音译姓名），字勋卿，又字敦伯。

南怀仁 1623 年 10 月 9 日出生在现今比利时的皮特姆（Pittem），18 岁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他的前半生是在欧洲度过的。1658 年他来到中国。继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 之后，南怀仁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为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社会、家庭及青少年时代

南怀仁时代的欧洲和比利时

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14 至 16 世纪欧洲出现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结果是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15 世纪末，由于欧洲各国的重商政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市场的需求，出现了竞相探求海外航路的情形。新航路的开辟，促使欧洲各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和殖民掠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欧洲人来到了亚洲，来到了中国。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这是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卷二七二）南怀仁传开始的一句话。其实，在南怀仁时代，比利时处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1555～1713)，是西属尼德兰的一部分。“尼德兰”是荷兰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Nederland 一词的音译，意为“低地”。在 16 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指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相当于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的东北部。比利时于 1830 年独立，是西欧各国中最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之一。

16 世纪是欧洲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是欧洲由封建社会晚期向着推翻封建专制、确立开明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权力之争、领土之争、教派之争连续不断，十分激烈。16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Carlos I,1500～1558) （他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统治着欧洲（包括西班牙、德意志、尼德兰及意大利的一部分）和美洲的广大属地。他把尼德兰的 17 个省归并为一个名义上的帝国，而通过封爵的诸侯对每个省分别实施统治。当时，政治权力的制衡体现为，一方面是诸侯的统治，另一方面是代表贵族、教会和市民的等级代表机构的三级会议。1556 年，查理一世让位于儿子腓力二世(Felipe Ⅱ，1527～1598)。 腓力二世为了称霸欧洲，不断发动战争，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时期，在罗马天主教内发生了大规模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即宗教改革运动。运动在欧洲许多国家迅速展开。在尼德兰，主要由于上述几条大河的地理因素的关系，北部诸省的人们大多信仰新教，南部诸省的人们大多信仰天主教。查理一世在位期间 (1516～1556) ，与天主教上层贵族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宗教改革，并与新教诸侯进行战争。腓力二世在位期间（1556～1598）极力维护天主教会，利用异端裁判所迫害“异端”，以加强其专制统治。

16 世纪中叶，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人们原来赖以生存的农业，这时已形成了愈益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而城市手工工场和商品经济则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羊毛（从英国进口）纺织、铜器制作、印刷、玻璃工业及钻石琢磨等手工工艺方面。商品贸易刺激社会其他方面发生着日益显著的巨大变化，人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教堂和市政建筑、绘画、艺

术、学术等方面看到这一点。但是，由于联姻和封爵，财富迅速转入了贵族手中，一方面是为数有限的豪门巨富，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总之，在西班牙的专制封建统治下，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1566 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天主教会和西班牙统治的“圣像破坏运动”。群众冲进教堂，捣毁圣像，焚毁债券和地契，没收教会的财产。有数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随之，尼德兰又掀起了反西班牙统治的武装斗争。人们组成陆上和海上的游击队，袭击敌人。几年之后，1572 年，尼德兰北部爆发了人民大起义。南方的反动贵族慑于人民力量的壮大，迅即与腓力二世妥协，达成协议，保持地方特权；而北方各省和南方部分城市为对抗南方贵族的叛变，则结成军事和政治同盟，继续斗争。此后数十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战争，终于导致了尼德兰 17 个省的分裂：尼德兰的北部宣告独立，成为新建的荷兰共和国；而尼德兰南部诸省则仍由西班牙统治。直到 1713 年，乌得列支和约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尼德兰南部各省又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1713～1795).

尼德兰的分裂也反映在了语言方面。在独立的北部诸省，其共同语言发展成为荷兰语；而在南方，其共同语言则是另成体系的所谓“佛兰芒语”。如今的比利时，东部讲德语，南部讲法语，北部讲实为荷兰方言的佛兰芒语——它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荷兰语，因为从 1946 年起，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对荷兰语已有共同的拼写规则。

总之，16、17 世纪，战争频仍、破坏不断，加上灾荒饥馑、疾病瘟疫，民不聊生，的确是比利时史书上所称的“灾难世纪”。而当时比利时所辖领土，则持续遭受着外族的统治。这正是南怀仁生活和成长的时代和土地。

家庭——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

了解南怀仁的家庭的历史，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个性及文化方面的背景。我们关于他的故事的叙述，就从他的祖辈和父辈开始。

关于南怀仁的祖父母的名字，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南怀仁的祖父名彼得乌斯·弗比斯特（Petus Verbiest），祖母名帕沙西亚·德沃尔夫（Paschasia de Wolf）。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南怀仁在 1674 年（康熙十三年）进呈《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四卷及《灵台仪器图》二卷，之后被授太常寺卿衔。他在 1678 年又进呈了《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被授通政使司通政使职衔。1676 年他被授通奉大夫。康熙皇帝为表彰南怀仁在治理历法方面的功绩，又封赠南怀仁祖辈和父辈，诰封其祖父和父亲为通奉大夫，其祖母和母亲为诰命夫人。这里所说的祖父母的名字，是在封赠南怀仁祖父母的封册上书写的名字。

另一种说法是，南怀仁的祖父名帕沙西乌斯·弗比斯特（Paschasius Verbiest），祖母名尤多卡·范德斯特雷特（Judoca Van der Straete）。比利时有的学者多年来对南怀仁家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这应是祖父母的名字。而封赠南怀仁祖父母的封册上的名字，则实际是其曾祖父母的名字。

依据清代的惯例，诰封的制度及程序是：皇帝于某年某月某日，给予某官员及其妻室封典（称为“授”）；十日之后，给予该官员祖父母封典（存者称为“封”，已去世者称为“赠”）；再十日之后，给予该官员父母封典（亦称“封”或“赠”）。对于一品官员，封典曾祖父母以下；三品以上官员，封典祖父母以下；七品以上官员，封典父母以下；九品以上官员，则仅给予其本身。看来，错误很可能出在这里。即在康熙皇帝诰封时，很可能由于南怀仁本人的缘故，将其曾祖父母的名字误为其祖父母的名字

了。

因此，关于南怀仁的祖先，现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其曾祖父母，即彼得乌斯·弗比斯特（Petus Verbiest）和帕沙西亚·德沃尔夫（Paschasia de Wolf）。他们居住在西佛德兰省省会布鲁日（Bruges）。布鲁日靠近北海，起初位于茨文河口湾处，曾经是中古时代欧洲著名的贸易中心。但由于中古时代末期频繁的战争，布鲁日港早已淤塞，加上沿海地区海盗出没，它已无昔日的繁华。不过，这时的布鲁日仍有大约 4万人口，是北欧的大城市之一。

南怀仁的祖父帕沙西乌斯·弗比斯特（Paschasius Verbiest，？～约 1603），在 1603 年或者更早一些就去世了，去世时还很年轻，大概只有 30 岁左右。祖父母有三个孩子：长子尤多克斯（Judocus），即南怀仁的父亲，大约生于 1593 年；次子彼得（Peter），生于 1595 年；女儿帕沙西亚（Paschasia），生于 1598 年。祖父去世的时候，他的三个孩子还都很小，大儿子才 10 岁，小女儿才 5 岁。可以想见，祖父的去世，显然使得原本尚可度日的家庭，立即陷于困境。祖母尤多卡·范德斯特雷特（Judoca Van der Straete，？～1642）要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抚养成人，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祖父去世后不久，祖母被任命为布鲁日一所著名的市立学校“果园学校”（Bogaardenschool）的首任女主管，这是一所专门招收孤儿男孩的学校。祖母的工作是负责学校里 100 多个 9 岁至 19 岁的男孩，以及教师们和校长的吃饭、住宿和洗衣等等事务。祖母之所以被委任这样的职务，主要是得益于她的两个兄弟，他们都曾就读于布鲁日的这所学校，并与教会关系密切。一位名约翰（John），是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最终成为布鲁日修道院的院长；另一位去世时是意大利南部雷焦（Reggio）的大主教家族的总管。约翰还朝觐过耶路撒冷和西奈山。南怀仁幼年时常听他的父亲尤多克斯讲这两个舅舅的生平和旅行经历。事实上，布鲁日的这所学校与方济各修道院有很深的渊源，这所学校的许多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后来都成了方济各修士。

学校董事会破例地允许祖母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在学校里住宿。按照学校的规则，布鲁日市家庭贫困的 9 岁或 10 岁的孤儿男童，具有正常或良好智力者，可申请在该校读书。当他们的学业期满时，学校董事会要对这些年轻人的将来作出决定。他们的去向有这样几种情况：多数人将开始进行五至六年的实践训练，从而成为技能熟练的劳动者，如成为木匠、裁缝、男仆、印刷工人、秘书或办事员等等；一部分人将允许继续学习，比如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中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然后成为教士；最优秀的学生则被送到鲁文大学或杜埃大学继续学习，其一切费用均由学校负担。

祖父母的两个儿子—— 尤多克斯和彼得，于 1603 年获准在布鲁日的这所市立学校读书。祖父母的女儿帕沙西亚（1598～1654）则于 1606 年进入一所女童孤儿院读书，直至 1615 年。两年之后，她 19 岁，与原来也是“果园学校”学生的裁缝科内利乌斯·范赫克（Cornelius Van Hecke，？～1657）结婚。他们有八个孩子，夫妇二人先后于 1657 年和 1654 年在布鲁日去世。祖父母的次子彼得 1595～1641）在“果园学校，，读到 1611 年。这一年他 16 岁，开始在佛兰德省的奥登堡城（Oudenburg）进行法官秘书和行政秘书的实践训练。后来他在布鲁日任办事员和公证员， 1641 年在布鲁日去世。他的末代后裔死于 1760 年。

祖父母的长子—— 南怀仁的父亲—— 尤多克斯（1593～1651）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学生。1611 年，他 18 岁；“果园学校”的校长克里斯蒂安·杨森（Christian Janssens）决定送他和其他几名学生到杜埃大学学习哲学，后来他们都成了教士。现处法国北部的杜埃（Douai），在布鲁日南偏西约 100 公里，该城当时属尼德兰的第 17 个省。两年之后，尤多克斯获文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Arts）。1613 年底，他回到布鲁日，在母校“果园学校”任拉丁文教师。他在这里，在保护者和精神之父克里斯蒂安·杨森的指导下，工作了两年。他的母亲仍在该校任主管，事实

上，她在“果园学校”作了大约 40 年女主管，直至 1642 年在这里去世。之后，尤多克斯离开了布鲁日的学校和家，他被任命为布鲁日东南 30 公里远的一个小城蒂尔特（Tielt）的一所著名拉丁文学校的教师，同时他也是该城教堂司事。尤多克斯因其学识而在这个小城有着极好的声望，他文笔优雅、书法隽秀，市政部门多次请他为市政府、教堂以及公共机构起草和书写公文与信函。

尤多克斯于 1617 年与安娜·范赫克（Anna Van Hecke）结婚。这位年轻的夫人与布鲁日的几个显赫的家族都有密切联系，其中的两个家族闻名于该城法律界，她同时还与“果园学校”有来往。或许正是由于与蒂尔特市政部门的关系，以及由于他妻子的家庭背景，激励了尤多克斯攀进身之阶、走参政之路。1620 年，尤多克斯被佛兰德省政会任命为根特（Ghent）的公证人。根特是一个比布鲁日大得多的城市，有数万居民，它在布鲁日东偏南，两地相距大约 70 公里。两年后，尤多克斯又被任命为蒂尔特附近一个相当大的村庄皮特姆的执行官。这个地方大约属于科特赖克（Kortrijk，在布鲁日南大约 50 公里）管辖，科特赖克的最高市政官费迪南德·范德舒尔（Ferdinand Van der Schuere）任命尤多克斯为皮特姆及西佛兰德其他地方的执行官。于是，尤多克斯成为这个村庄及其周围地区的头号人物，即他身兼当地最高市政官、法官、公证人和税务官数职于一身。尽管官阶不高，职位却很重要。

尤多克斯于 1622 年底在皮特姆定居。在皮特姆教堂附近的市场旁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就是尤多克斯的新居——1623 年 10 月 9 日，南怀仁就诞生在这所房子里。尤多克斯在皮特姆的任职，也是他官场生涯的新起点。1623 年 5 月，他被任命为科特赖克城堡土地的自由市政官，这意味着他是管理科特赖克城周围大片领地的大约 60 个城镇和乡村的 11 位市政官之一。他任此职直至 1651 年去世。他的妻子安娜于 1665 年死于疫病。他们二人都葬在皮特姆教堂墓地。

南怀仁的父母共生了七个孩子——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南怀仁排行第四，他上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姐尤多卡（Judoca），1618 年生，1634 年因疫病卒于皮特姆。二姐凯瑟琳（Katherin），1620 年生，于 1658 年嫁给科特赖克的商人范德文克（R. Van de Vinck）。哥哥约翰·巴普蒂斯特（John Baptist），1622 年生于蒂尔特，1659 年卒于科特赖克。由于父亲的缘故，他也曾任执行官、税务官、自由市政官及法官等职。但他资质较差，因此一生中多次变换工作，最终贫病而死。大妹杰米娜（Jemina），1626 年生于皮特姆，1678 年卒于父母故居。她于 1650 年与当时任本村秘书、后任本村村长的约翰·勒斯特（John Lust）结婚。弟弟阿尔伯特（Albert），1628 年生于皮特姆，1694 年因疫病卒于皮特姆西南相距约 20 公里的鲁瑟拉勒（Roeselare）。他自杜埃大学领有律师开业证书，但在一生中频繁变动工作地点，他曾任律师、执行官、公证人，也当过平民。他于 1658 年与凯瑟琳·伊森伯特（Katherine Isenbaert）结婚，1688 年丧妻。他们有七个孩子，但在他去世时只有两个孩子还活着。小妹安（Ann），1630 年生，1681 年卒于科特赖克。

总之，南怀仁的祖辈居住在布鲁日，因祖父早逝，家境贫困，祖母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所市立孤儿学校中。南怀仁的父亲是杜埃大学文学硕士，先后担任过地方上的一些职务，是当时当地一位有学问的重要人物。在南怀仁来到世上之时，家境与 20 年前祖父去世时的状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父亲所受到的教育和任职的经历，南怀仁不再是普通的城市平民或农民家庭的子弟，而是地方上颇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

青少年时代

1623 年 10 月 9 日，皮特姆地方长官尤多克斯·弗比斯特的夫人安娜生了一名男婴。这是弗比斯特家的第四个孩子，在此之前他们已有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因此这个男孩的出生，对这个

家庭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家境小康、仕途顺利，弗比斯特夫妇还是很高兴又有了一个儿子。当地的人们普遍信仰天主教，弗比斯特家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他们夫妇与受到教会支持与资助的机构和学校的关系都很密切。依据当时的惯例，孩子出生之后不久，皮特姆教堂的神父在司事的帮助下为这个男孩施行了洗礼。尤多克斯与科特赖克市的最高市政官费迪南德·范德舒尔关系颇好，于是请这位顶头上司做这个男孩的教父，并给孩子取名费迪南德。自然，谁也不会料到几十年后费迪南德成了在遥远的中国享誉盛名的人物。

南怀仁在皮特姆度过了他的儿童少年时代。他和兄弟姐妹一起游嬉玩耍，家里的房子很大，户外也有大片的空地。他常去教堂里玩，教堂离他家很近，神父和司事都与他家熟识。当时的儿童们大多在教区、修道院或教会慈善机构所开办或附设的初等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南怀仁也不例外。稍长，他进了这个村庄的小学校，教堂司事是那里的教师。父亲尤多克斯为了城堡土地及乡村的一些事务，常常要到科特赖克、根特、布鲁日和布鲁塞尔去。他回到皮特姆后，总要给妻子安娜和孩子们讲些外界的事情。

很快南怀仁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了。1635 年，他 13 岁，父亲送他到布鲁日读中学。布鲁日是他的祖父母成长和生活的地方，祖母尤多卡还在那儿的“果园学校”当女主管。南怀仁有时到“果园学校”去看望祖母。在途经旧市场会议厅或圣巴西勒教堂时，他总要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望高耸的钟楼；而每逢盛大节日，钟楼上奏出的悠扬乐曲更使他神往。一年之后，父亲把他转到科特赖克读书。南怀仁的教父范德舒尔是该市的市政官、律师和法官。南怀仁有时也去教父家。教父带他去参观哥特式建筑的市政厅和圣马丁大教堂，还有建于 1400 年的带两座巨塔的布罗尔堡大桥。在教会开办的中学里，有关宗教教义和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是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们的虔诚善良的人生操守。南怀仁离开父母在布鲁日和科特赖

克上学的几年间，眼界显然比在家乡时开阔了。事实上，地处尼德兰南部的这一片地区，是邻国觊觎的战略要地，也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由于断断续续的战争，南怀仁亲眼见到行进在市内和乡间的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的大队士兵。战争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南怀仁目睹了皮特姆教堂和房舍的重建。可怕的疫病流行，不时夺去善良的人们的生命。就在南怀仁上中学的前一年，16 岁的大姐尤多卡病逝了。

1640 年 10 月，南怀仁进入鲁文大学学习。

鲁文在科特赖克以东大约 180 公里，它原来是一个以织布业为中心的城市，后来不仅发展为一个农业市场，更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鲁文大学历史悠久，它建于 1425 年，是比利时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中心之一，曾经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人文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另一方面，鲁文大学建校以来即以天主教研究中心而享盛名，并重视对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研究，它是 16 世纪尼德兰反对宗教改革思想的主要中心。这所大学在 16 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历过生死存亡的危险时期。那个时期，鲁文曾数次遭受洪灾、三次被军队围困，加上鼠疫流行，人们大量死亡，继之又严冬和饥荒，几乎毁灭了这座城市和大学。但鲁文大学在最危急的关头还是存在了下来。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1502～1585）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财政支持下，16 世纪 80 年代后期，大学的正常活动一点一点地恢复起来。16 世纪末开始，鲁文大学的重建成为政府的市政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随着对该大学的全面整治以及新组织法的颁布，学校活动的各个方面，如关于学生的训练、教学的组织、大学法庭的功用、大学特权的使用、选举和任命问题、教职员的权力和责任等等，都得到了规范。政府在大学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到 1626 年这所大学庆祝它建立 200 周年之时，大学已创建了许多所学院，有颇具声望的一批教授和学者，有来自欧洲各地的将近 2000 名学生，许多建筑物都被修葺一新或者扩建了，各个机构的运作正常。尽管几年之后，大学又曾遭到过法、荷军

队的围困，当地又曾发生过鼠疫，但这些并未危及鲁文大学新的繁荣。总之，在南怀仁进入鲁文大学之时，该校已完成了历经半个世纪的恢复、发展和重组。学校的规模更大了，共有大约 40 所学院，有新建成的中心图书馆等许多设施，还有许多因其学识和著作而闻名欧洲的教授们。

当时，进入鲁文大学的所有新生（除教会团体的成员外），都要先在人文学院学习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数学，还有必修课程拉丁文。这里要顺便说到，在那个时代，所有学校都要开设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古典语文。拉丁文更是倍受重视，因为它是学术论著和文书信函所用的一种文字，甚至被视为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乃至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前面提到过南怀仁的父亲尤多克斯，曾任布鲁日的母校的拉丁文教师，他为人尊敬的原因之一，是有一手优美的拉丁文文笔。所学主要科目的课时分配是：九个月的时间学习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的逻辑学以及学习辩证法的规则；八个月学习自然哲学；四个月学习形而上学；最后三个月的时间是将全部课程整个重复一遍。在星期日和假日，则学习伦理学。至于语文、历史等科目，则都在学习主要科目时附带教授。教授们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阐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其他著述，讲授这些课程。他们必须在所有论点方面，都遵循与基督教信仰并无矛盾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教学的方法是上午由一名教授讲基本问题，下午由另一名教授讲较为特殊的问题。学生要在这样的授课方式下学习两年。两年之后，学生须参加一系列的考试。班级和整个学院会为考试合格者举行庆祝，他们本人则在其出生地荣耀地接受大家的祝贺和众多的礼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在大学、教会或法院继续其光辉的生涯。学生一旦从人文学院毕业，则须在更高一级的院系中作出选择。他可以在神学、法律或医学领域继续其学业，考虑到日后的各个方面，多数人常于教规和民法两者兼而顾之。医学需再学习三年，法律学四年，神学则需学七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学习期满合格，可得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证书。只有获得学位证书的人，才有可能任教授、开业当医生或律师。

南怀仁进入了这所有名望的学校学习。我们现在很难确切知道南怀仁究竟听过哪些教授的课。然而，从鲁文大学的历史文件以及对该校历史的许多研究中，多少可以知道一些当时教学的情况。前已述及，当时教给学生的仍然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学说，但这时也正是新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概念开始在鲁文大学出现之时。哲学教授、同时也是基础医学教授的威廉·菲力普（William Philippi）是该校最早介绍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哲学的人之一。数学代课教授赫拉德·范古乔温（Gerard van Gutschoven）也是笛卡尔主义者，他在教学中介绍笛卡尔的数学发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概念。至于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学说的基本概念，则早在 1540 年代就由赫玛·费里西乌斯（Gemma Frisius，1508～1555）接受了，他是鲁文大学的医学和数学教授，也是地球仪和天文仪器的建造者。当然，在罗马教廷于 1616 年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列入禁书，以及 1633 年再度谴责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及其著作《关于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1632）之后，鲁文大学的教授们在教授哲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宇宙论时，不得不十分谨慎，他们虽然讲解托勒密（Ptolemy，2 世纪）体系、哥白尼体系和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体系，但不对它们作出评论和选择。

南怀仁和同学们日夜共处，他们一起上课听讲、一起吃饭就寝。这些同学中的两位，后来事业有成。一位是亨里克斯·斯凯尔（Henricus Scaille，1624～1689），他后来成为神学教授、圣灵学院院长。另一位名气更大的同班同学，是深受威廉·菲力普影响的阿诺德·海林克斯（Arnold Geulincx，1624～1669），他于 1646 年成为鲁文大学的哲学教授，1658 年（南怀仁到达中国的那年！）又成为莱顿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被认为是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之后荷兰最伟大的哲学家。

南怀仁在鲁文大学学习期间，开始系统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在学习宇宙论的内容时，涉及到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他亲耳听到一些新的思想，亲身感受到一些新的理论对传统学说的挑战。此时正是这位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的青年求知和成长的关键时刻。可是，在这里学习了一年之后， 1641 年 9 月，南怀仁离开了鲁文大学。他加入了耶稣会，赴梅赫伦（Mechlin） 修道院学习。

二、入耶稣会及早年的宗教生涯

南怀仁入耶稣会的背景

16、17 世纪，在基督教的内部和外部，都出现了十分激烈的斗争。16 世纪发生了基督教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宗教改革运动。它是在罗马天主教内发生的大规模的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提出反对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否定教皇和教会享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威等等。宗教改革运动发端于德国，而后迅速在欧洲许多国家展开，得到了广大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市民阶级的普遍拥护。结果陆续产生了代表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各宗派。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在英国、德国、北欧各国等地取得了优势地位；而天主教则在一部分国家丧失了统治地位，主要分布在南欧各国，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

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南北两部分人心向背迥然不同，北部诸省主要信仰新教，南部诸省主要信仰天主教，形成了明显的宗教对立状况。16 世纪中叶，天主教举行了特兰托会议，通过了加强教皇集权统治、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系列决议。之后，天主教在西属尼德兰南部又有很大发展，几乎所有教区都建立了修道院，从事圣职的人员数量很多。各教区的主教们须定期去罗马报告本教区的情况，教廷则派有代表常驻布鲁塞尔。为了在尼德兰恢复天主教的广泛的信仰，神学教育也渗透到各级学校的教育之中。教会开办或资助学校，宣讲和传授教义，这种情况从中小学校直到大学，包括鲁文大学和 1562 年成立的杜埃大学，均普遍存在。天主教的各派别也竞相扩张势力，如圣方济各会积极在普通群众中发展（我们还记得南怀仁祖母工作的“ 果园学

校”与该会关系密切），圣奥古斯丁会与耶稣会则注意在中等学校中活动（南怀仁在布鲁日和科特赖克就读的中学，与耶稣会关系密切）。总之，这个时期不仅明显地存在着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斗争、新旧教派之间的斗争，而且在罗马天主教中也存在着不同派别的竞争、矛盾和冲突。

这里需要特别谈一谈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于1534年创立，1540年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该会的宗旨是重振罗马天主教。会规强调其成员即耶稣会士必须绝对忠于教皇，无条件地执行教皇的一切命令。该会通过打入宫廷和上层社会，加强罗马教皇的政治势力，又通过开办学校和学院，进行宗教和文化教育，扩大其影响。耶稣会从1542年即深入尼德兰，1564年在尼得兰建立了教区。到1630年时，耶稣会在尼德兰已拥有1700多名会员（将近耶稣会士总人数的1/10），并建立了40多个机构。比如在鲁文，1585年就建立了学生宗教团体；在科特赖克，也有这样的团体。耶稣会士的活动能量和所起的作用很大，尤其对社会贤达甚有影响。

在历史悠久的鲁文大学内，教会也具有相当的势力。鲁文大学从它最早的岁月开始，就享有一系列的特权，它们限定了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起初，在西属尼德兰境内，只有鲁文大学有资格公开教授哲学、神学、法律和医学，以及能够授予学位。然而被国王数度认可的这种特权，引起了与耶稣会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在鲁文大学内，有耶稣会的机构，但它并不是大学的一个部分。耶稣会享有教皇赋予的特权，它准许教会组织讲授哲学和神学，以及授予学位，甚至可以授予那些不是耶稣会成员的人。16世纪末，鲁文的耶稣会士试图组织代表大学的哲学讲演并授予学位、而且拒绝承认大学的权威时，公开的冲突发生了。至教皇克雷芒八世（Clement Ⅷ，1536～1605）在位期间（1592～1605），情况稍有缓和。但他死后，17世纪初，冲突又多次爆发。直到1626年，在代表大学派赴西班牙宫廷的神学教授科内利乌斯·扬

森（Cornelius Jansenius，1585～1638 ）的努力下，终止了这场争执。但是，冲突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耶稣会士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1640 年，正值耶稣会成立 100 周年。耶稣会士们举行了空前盛大而热烈的庆祝，尼德兰的耶稣会的所有团体也都举行了庄严隆重的仪式。此时，南怀仁尚未进入鲁文大学，他只是科特赖克耶稣会开办的中学的一名学生，不过，他参加了那里的庆祝活动，听到了对耶稣会、对它的成员及其成就的赞美之词。他尤其钦佩耶稣会士的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这种精神使他激动不已。进入大学后，他依然还能亲身感受到那里犹存的热烈的庆祝气氛。确实，宗教团体在鲁文的学生中间的活动极为成功，以致于它很快就分成为四个部分：一部分是哲学学生的团体；第二部分是神学学生的团体；第三部分是法律和医学学生的团体，皇帝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Ⅲ，1608～1657 ）在 1640 年加入了这个团体；而第四部分则是全体圣徒的一个秘密团体，由其他三部分的杰出人物所组成，并且其成员须经过特别的起誓。就南怀仁而言，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否参加了耶稣会在科特赖克或鲁文的学生宗教团体，但无论如何，他对一些事情会或多或少地耳闻目睹。

鲁文耶稣会士节日般的欢乐气氛，被一场宗教争论结束了。其实，反对耶稣会神学思想的斗争在 16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鲁文的神学家们正式地谴责了耶稣会最著名的神学教授莱昂纳德斯·莱修斯（Leonardus Lessius，？～1623） 的教学，但耶稣会认为如此正式地随心所欲地谴责耶稣会的教义是不能容忍的。莱修斯去世后，鲁文的耶稣会士试图宣告其为圣徒而使他的学说合法化。1640 年，科内利乌斯·扬森的著作《奥古斯丁论》（Augustinus ）出版，耶稣会的神学思想在该书中公开地受到攻击。扬森不仅为奥古斯丁的学说辩护，还曾代表大学两次赴西班牙宫廷，保卫该学说在教学中的垄断地位。因此，他被鲁文的耶稣会士视为主要敌人。耶稣会士认为，扬森是要通过其长篇的解释著作将奥古斯丁学说合法化，其著作的出版就是直接反对耶稣会士。于是，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企图阻止该书的发行，不

过未能如愿，但他们成功地使得罗马当局在 1641 年和 1643 年两次禁止该书。然而，扬森的观点，即所谓的“扬森主义”，在西属尼德兰的宗教界、知识界、政界以及公众中都有很大影响，尤其得到知识界人士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所以，斗争在神学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同时展开。在几个月的公开冲突中，可以看出，鲁文大学的多数人反对耶稣会士，这大概是因为知识界人士大多不愿意看到耶稣会士给公共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的缘故。可是，耶稣会士动员了他们所有的朋友来反对扬森。在 1640～1641 年耶稣会士反对扬森的多次攻击中，最轰动的是发生在 1641 年 3 月 22 日的事件，许多学生参加了保卫活动，它持续了整整一天且混乱异常。有关扬森主义的争论，是后来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的开始。这场宗教争论，因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1649～1721）于 1713 年再度谴责扬森主义，而又复起，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中叶，以罗马教廷和耶稣会的最终胜利而结束。但是不久，1773 年，耶稣会被罗马教皇解散。

南怀仁进入鲁文大学之后，在课堂教学和公开讲演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几个月来发生的公开的宗教争论的结果，似乎使得一些著名的教授此时都成了耶稣会的公开的敌人。前面提到过的哲学教授威廉·菲力普、数学教授赫拉德·范古乔温，等等，都拥护扬森主义，而这些人是南怀仁在大学中每天都要遇到的。鲁文大学是一所负有盛名、学术气氛浓厚的学校，然而现在的学术环境却是大多数人生活在公开的冲突之中。南怀仁是在耶稣会开办的中学里读书成长的，他更相信耶稣会。他意识到，他必须尽快作出抉择，而不能等到在人文学院的课程结束之时。比较起大学里封闭的学术环境、矛盾和冲突纷呈的世界，南怀仁感到，另一个更富有挑战性、更令人神往的世界，正在召唤和等待他。

1641 年 9 月，南怀仁离开鲁文赴梅赫伦。他在鲁文大学学习差不多整整一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